

氣壯山河，虎虎生風

——悼念何炳棣教授

本來今春何公要到香港來講學，他的門生故舊把一切都已經安排好，後來忽然聽和他相熟的梁其姿教授（我的外甥）說，他決定遵醫囑取消講學，不來了。這是少有的改變，我聞訊頗為不安，於是打電話去問候。他聲音仍然清晰有力，還問起將來到香港長住的可能，這在當時自然無從談起，只好唯諾以對。過不多時又聽其姿說，他連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和早已經定下的講座也都取消，看來情況不妙。果不其然，沒有多久大洋彼岸就傳來噩耗，史學一代大師與世長辭了！

最早見到何炳棣教授，是大約四十年前，在他有關中國石油前景的演講會上。記得曾經站起來請教一個小問題，他誤以為我存心質疑，反應強烈，這是我初次體會他的剛猛性格，以及他那一代學人的民族情懷。其後有機會拜讀先生一些專著，如《東方的搖籃》（*Cradle of the East*）和《明清社會史論》（*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*），開始感受他的氣魄和雄才。但有幸識荊，則是1990年代的事情了，那時他主動把批判杜維明的文章投到《二十一世紀》來，令我們受寵若驚，而由此掀起的筆戰，更使本刊名動一時。自此他不時惠稿，為篇幅增光，但我們失諸交臂，竟然沒有想到邀請他擔任編委，實為憾事。其後先生訪港，開始有些交往，因為他老人家個性率真，談鋒朗健，所以雖然輩分有別，仍可以談笑不拘，忘年相交。以是之故，我得以與聞他和美國亞洲學會（AAS）會長羅友枝（Evelyn S. Rawski）有關清皇朝統治基礎的那場大辯論，甚至在催促下對他的文章草稿談了些看法。近十年前，先生以自傳手稿見示，又應命提了幾點小意見，出版後並遵囑撰寫讀後感在《讀書》發表，這樣，對先生的為人與學問，又增加了一些認識。

先生的一生，可謂戰鬥的一生：從青年時代「考清華，考留學」求出人頭地開始，到中年「扎硬寨，打死仗」立足西方史壇，以至日後為中華文明起源開創新說，駁斥新儒家，討伐羅斯基，為老子的時代、《孫子》的意義，以及墨家的真正影響等思想史重大問題翻案，都莫不顯出一往無前氣概與開天闢地精神。這一方面出自他的才氣與性情，更重要的，當是他接受了歷史的客觀真實不但存在，而且只要搜集足夠證據，便是可知的，這樣一個根本假設之故吧——正因為有此客觀真實之存在，爭辯和戰鬥便是有意義，甚至必要的了。在此戰鬥的一生中，何公為中國當代史學引進新方法，樹立新典範，也成就了大學問。然而，史學真諦究竟何在，於今猶聚訟紛紜，劍橋史家布里（J. B. Bury）「歷史是科學，不多也不少」之說，更未曾被普遍接受。以是，何公晚年多篇「畫龍點睛」的思想史力作，是否能夠如他在人口、土地、社會流動等具體問題上的那些經典，同樣成為定論，恐怕猶有待歷史檢驗，他所掀起的爭論，也可能延續下去。在道術為天下裂的當今世界，這或許是無可避免的了。

中國傳統文化尊尚圓融和諧，學者處世講究儒雅謙讓，像何公那樣，治學衝決網羅，獨樹一幟，為人氣壯山河，虎虎生風者，是頗為罕見的。但在我們這古老國度吐故納新、更新自強的大變革中，這當亦是可式可敬的一個典型吧。陶公有云：「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」何公去了，但他的聲教，他的直率和氣魄，仍將長久留存在我們心中。

陳方正

2012年仲夏於用廬